

梵諦岡密件·日本天主教會·基督信仰

嚴永晃

日本由於經濟高度發展，社會相對穩定，基督信仰卻極度弱勢，是所謂 G8 甚至 G20 的經濟大國裏，天主教信徒最少的國家，與近鄰韓國天主教會的蓬勃發展相比，堪稱波瀾不興，筆者心裡一直十分困惑。今年五月初，梵諦岡爆發重大醜聞——教宗的管家偷竊大量教廷機密檔案，讓義大利記者集結成新書《聖座：本篤十六的密件》出版，內容包含一篇教廷前駐日本大使對日本天主教會的分析，筆者終於恍然大悟。僅將日本天主教會的發展簡史，近況和長期「不振」的原因，略予整理，請讀者指正。

天主教在日本的發展，始於 1549 年聖方濟·沙勿略東渡，從鹿兒島登陸日本，在九州、近畿等地傳教，開啟了天主教在日本的發展。在當時東西方交通仍然不便的年代，陸續有耶穌會、方濟會、道明會、奧斯定會等修會來到日本傳教。除了傳教事業之外，也設立學校與醫療機構，引進當時西方先進的技術與思想。由於傳教士們的努力不懈，使得日本天主教會快速發展。根據 1614 年的統計，當時日本有一百五十名神職人員，以及超過六十五萬的平信徒，而天主教思想也深入日本的統治階層，如兩家公卿（相當於現在中央部會的部長）與五十五位大名（相當於省長）皆領洗成為天主教徒。

但天主教的蓬勃發展，被當時的武士政權視為威脅，使天主教在日本一度遭到禁止的命運。1587 年，豐臣秀吉頒佈《伴天連追放令》（傳教士放逐令），首次對天主教發佈禁教令；1596 年，豐臣秀吉再次發佈禁教令，造成廿六名天主教徒在長崎殉道，即現今所稱的日本二十六聖人（注 1）。進入江戶時代後，江戶幕府也多次發出對天主教的禁教令，導致多起殉道事件的發生，其中又以 1622 年發生的元和大殉教最為嚴重。這段時間正逢日本實施鎖國政策，日本本籍的神職人員和平信徒遭到迫害，而外國籍的傳教士也被禁止進入日本；雖然如此，仍有部分平信徒持續禮儀，並以各種秘密的方式（如將聖像雕塑成佛像造型）將信仰延續下來，其中大多數集中在今日的長崎縣境內，這些人在日後被稱為「隱藏的基督徒」（類似中國的「地下教會」）。（注 2）

經過將近三個世紀的禁教後，為了重啟日本的傳教事業，教廷在 1846 年成立日本宗座代牧區，並委由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負責管理。當時巴黎外方傳教會派遣會士希歐多爾·奧古斯丁·福爾卡德（同時為第一任日本宗座代牧）從琉球抵達長崎，試圖進入日本傳教，但因鎖國政策而未能成功。至 1857 年幕府解除鎖國後，外籍傳教士在 1858 年被准許進入日本，在長崎、橫濱、函館等港口城市從事傳教事業。1865 年三月十七日，長崎的「隱藏的基督徒」來到啟用不久的大浦天主堂，並與在此服務的神父接觸，使得這些禁教以來仍世代傳承信仰的平信徒被世人所知，此事後來被稱為「信徒發現」，被認為是日本天主教史上的一個奇蹟。

經過這些突破後，日本的天主教事業逐漸復興。隨著日本教務的逐漸開展，除了巴黎外方傳教會之外，教廷也開始委託其他修會開展教務，如道明會負責四國、聖言會負責新潟、方濟會負責北海道等，這些修會除了傳教外，也設置各式學校與文化社福機構，以使基督信仰更深入人心。

教會管區也漸次建立，首先是日本宗座代牧區在 1876 年五月廿二日分拆為日本北緯宗座代牧區（東京總教區前身）和日本南緯宗座代牧區（長崎總教區前身），接下來在 1888 年、1891 年又分別分拆出日本中部宗座代牧區（大阪總教區前身）與函館宗座代牧區（仙台教區前身），日後再不斷擴張至現今的十六個教區。而 1889 年頒佈的《大日本帝國憲法》中，明確規範宗教信仰的自由，也確保日本天主教會的事業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擾。1891 年六月十五日，日本建立聖統制，

象徵日本天主教會，從傳教區體制轉為教務狀態漸上軌道的教區制。1960年三月廿八日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時任東京總主教土井辰雄為樞機，成為日本第一位擔任樞機者。

現今日本的天主教會共設有三個教省、十六個教區（包括三個總教區），以及七百九十八個堂區，設有一個主教團作為教會最高領導機構，日本政府與教廷亦建有外交關係。截至2010年底的最新統計，日本信仰天主教的人口為448,440人，僅占日本全國人口的0.353%，其中包括神職人員（包括主教、神父與執事）1,530人，修道者6,021人（含修士198人、修女5,823人）。信徒總數約44.8萬，只占日本國民的0.3%，但開教歷史悠久的長崎縣（長崎總教區）則是特例，天主教信仰人口占當地總人口逾4%。（而韓國的天主教信徒大約有400多萬人，約占韓國總人口的10%）。

除了教堂外，天主教會在日本各地設有多處文教與社福機構，包括醫療機構41所、社福機構576處、各級學校853所等。由於教會學校被公認不僅在知識和科學方面有嚴肅的教育，更培養社會生活、道德生活、尊重日本傳統的生活，因此對日本社會頗具影響力。包括70年代的日本首相**大平正芳**，2008年九月就任首相的**麻生太郎**，都是天主教徒。麻生太郎和其他許多日本政界人士，還都曾在天主教學校讀過書呢！

二戰後日本天主教會曾面臨兩個嚴肅的政治課題：

一是教會被嚴厲指責，在三十至四十年代，日本進行侵略活動期間，**與當時政府同流合污**；為此，日本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在1995年——紀念戰爭結束五十週年時，發表公開聲明，承認教會領導人在戰爭時期袖手旁觀，向受害者誠懇**道歉**。

二是特別針對韓國。由於韓國和日本就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侵略、佔領朝鮮半島問題上發生了磨擦，韓國人民強烈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、美化軍國主義，並否定日本帝國主義二戰期間在朝鮮半島犯下的殘暴戰爭罪行。日本天主教會於是積極致力於為韓國，乃至整個朝鮮半島人民與日本人民重新建立起和解的橋樑。兩國的主教團達成共識，在韓國和日本同時發表了兩國歷史問題文獻，兩國的主教定期舉行會晤，共同本著客觀的態度，在真理與和解的光照下審視歷史問題。近年來，此類會晤中還不斷增加了牧靈、神學和靈修等內容。同時，韓國和日本各教區輪流負責主辦，共同探討在亞洲大陸開展的福傳戰略措施，以及對中國神職人員和修會會士的培養教育工作。

至於戰後日本天主教信仰，為何長期停滯不前呢？為甚麼如此高度民主的國度，卻依舊遠離福音？為甚麼在一億二千多萬日本人中，僅有五十萬天主教徒？何以日本基督徒仍是國家中的絕對少數，但在毗鄰的韓國，近幾十年來，基督徒人口卻迅猛激增？教廷前任駐日本大使的阿爾貝托·卡斯泰洛（**Alberto Bottari del Castello**）總主教去年所寫備忘錄的分析，堪稱一針見血。

卡斯泰洛總主教曾駐節日本六年之久，經過與日本主教、傳教士及教友交流和反思，得出了如下的答案：

一日本擁有優秀的文明，輝煌的歷史，以及與某些象徵符號（天皇）及宗教情感表達（神道教、佛教）下的強烈民族認同感。皈依基督宗教需要脫離這傳統環境，這幾乎意味著「不再是日本人」；

—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強烈認同，在面對外來事務的影響時，令他們產生複雜的心理。他們開放而好奇。他們不但不願意丟棄傳統的文化環境，反而把新事務與之融合。正因如此，要他們徹底地信從福音，幾乎是不可能的奇蹟；

—天主教還被他們視為一無是處的西方現象，而西方社會的生活場景和生活方式，被大眾媒體傳播開來，譬如暴力、物質主義、腐化墮落等等，這些都被視為基督徒世界的一部分，因此他們難以接受。

實際上，這也是日本主教與「新慕道之路」（注 3）長久存在爭議的根源所在。「新慕道之路」的目的和善意值得讚賞，但他們與本土文化缺乏調適。他們到了日本之後，採用在歐洲孕育和發展出來的福傳方法，卻毫不關心能否適應本土環境。同樣的吉他伴奏，同樣的表現形式，同樣的教理講授，對日本人來說，可全都是外在強加的，以至於不僅在交談中不受歡迎，反而大量發生關係緊張、誤解和反彈的現象，最終導致全盤抗拒。

卡斯泰洛總主教結論說，去除歐化的包裝，展露福音的核心、純粹潔淨、貼近民心，才能推展福傳事業。

回顧臺灣天主教信仰，近五十年來持滯不前的情形同樣嚴重，卡斯泰洛總主教的結論和建議，其實應該同樣適用於臺灣和部分其他亞洲地區。

願上主祝佑基督信仰——天主教在日本和臺灣的發展。（美國加州洛杉磯喜瑞都市來稿）

（注1） 教廷於 2006 年核准一百八十八名日本殉道者封列真福品。

（注2） 日本主教團於今年二月宣佈，長崎的西阪——十六世紀廿六名天主教徒殉道的地方，為全國朝聖地。

（注3） 請參閱拙作“全球天主教 新慕道之路 成員持續成長”（本刊第 81 期）